

文翰说戎事 铿锵颂兵魂

——《诗经》军事文化理念略论

■陈曦 徐斌

卓越见识,以及为了拯救国难而不顾个人得失、不惜贡献全部力量的无私品格。《卫风·伯兮》则从一位思妇的视角切入,写她眼中的丈夫为“邦之桀兮”,手执长戈,战场上冲锋在前,“为王前驱”。这位被家中妻子日夜思念的人,不正是孔子所颂扬的“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爱国英雄吗?能被如此英雄爱上的,又该是何等靓丽的女子?思妇即使因想念成疾而无心装扮,“首如飞蓬”,读者仍能想象出她光彩照人的外表美。同时,还能从她“谁适为容”的坚贞不二中,充分感受到她恋家爱国的心灵美。

二、向往和平

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在孕育“安土重迁”“耕读传家”的社会心理的同时,也孕育了反对穷兵黩武、追求和平主义的民族意识。《诗经》对此已有充分反映。《周颂》所收的《酌》《桓》《赉》等《大武》乐章当作于《诗经》创作年代的上限——西周初期,其主旨是歌颂文王、武王给天下带来安宁,而非宣扬暴力。《周颂·时迈》也应该是西周初期的作品,诗中写周武王在灭商后能“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意即收起干戈支兵甲,将强弓利箭装入袋子),以示不复用兵,民众从此安享太平。正因文、武二王的思想行为是符合农耕社会广大民众最大愿望和根本利益的,他们才被视作明君,美名传颂不衰。

军人对农耕生活的重视、对美好家庭关系的追求,是《诗经》彰显和平理念的重要方式。《邶风·东山》写一位士兵在战后返乡途中,思绪被蒙蒙细雨牵动着在不同时空穿梭翻飞,其中第二章写他思念家乡,希望回归田园,躬耕垄亩,但又不禁担心在战争的冲击下,故乡已不复往昔,想象中的景象是“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疃鹿场,熠熠宵行”,真是遍地荒芜,满目凄凉!但即使如此,他仍声称“不可畏也,伊可怀也”,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都不能改变他对安稳有序的田园生活的依恋。再看《邶风·击鼓》,在这首从军题材的诗作中,竟出现了深挚感人的爱情誓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歌主人公在征战之余,预感到自己或将被战争魔鬼吞噬。此时他难忘当年对妻子的承诺。那是多么温馨、多么美好的时刻,他真不想贪食啊!和平环境中的人们能够过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生活,正是无数军人牺牲生命换来的,岁月变动不居,而此理亘古长存。

战争是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一种人类活动,与之如影随形的生命的消亡、家国的毁灭。只有那些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军人,或许才能更为深切地体会和平生活的珍贵。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南朝名将谢玄被问到《诗经》“何句最佳”,他答以《小雅·采芣》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4句,在“杨柳依依”的美好春日,诗歌主人公告别亲人,踏上征程。此别或是永别,离愁别绪充满心田。战场上他由春到冬,九死一生,历尽艰辛,最终幸运地凯旋返乡。“雨雪霏霏”是萧瑟肃杀的冬景,如王夫之所析——“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加倍衬托出了他战后生还的欢乐。这4句诗何以会得到谢玄的激赏?大概就在于作为淝水之战的前敌指挥,他深知打败强敌、重享和平的不易,因而对这种“别有一番滋味”的蕴含了军人悲壮情感的诗句情有独钟。

三、崇文尚武

《吴子·论将第四》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能文能武、文武双全,为中国历代军人所追求。然而该理想范式的倡导者并非始自吴起,因为其实《诗经》便已出现了标举这一思想的诗句。作于周武王时期的《周颂·雍》,以“文武维后”颂扬周王既有文德又有武艺;作于周宣王时期的《大雅·崧高》和《小雅·六月》,则分别以“王之元舅,文武是宪”“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歌颂宣王之舅申伯与名臣尹吉甫的文韬武略,说他们是世人称颂的楷模。这说明早在《诗经》时代,文武兼具而非偏执一端,已是评价人物的重要尺度。

《诗经》所崇之“文”,其核心要义为德,它是一种合乎周礼乐文明要求的精神品质。《大雅·皇矣》表彰文王具有“敬天保民”的美德,对待民众“不大声以色”(意即不疾言厉色),治理家邦“不长夏以革”(意即不用鞭棍),能够“顺帝之则”,遵循天意。这是文王的制胜之本,是他讨伐纣、崇等国而大获全胜的缘故所在。《大雅·江汉》强调宣王君臣是靠德行安抚民众而非以武力征服夷狄,如末章以“矢其文德,洽此四国”两句,颂扬宣王能施行德政,使四方协和,天下安定。《小雅·黍苗》的首章以“芾芾黍苗,阴雨膏之”起兴,暗喻召虎善待筑城军民,能像雨露滋润禾苗一样滋润众人人心田。修文德,振德抚民,《诗经》战争诗所赞扬的这种思想,可视为孔、孟所倡导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等理念的先导。

《诗经》所尚之“武”,是一种经过“周礼”浸染而滤掉了野蛮嗜血之风的勇猛气概。《大雅·常武》歌颂了周宣王平定徐国叛乱,诗题中的“常武”二字意即尚武,但作者对王师战士精神面貌的影显,不是通过血腥搏杀的写实笔墨,而是以颇具诗情画意的一系列比喻,即“王旅皞皞,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如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鲜明生动地表现了出征部队的行动迅速、势不可挡。《小雅·采芣》叙述方叔南征荆蛮,同样没有描写敌我双方交战的残酷场面,而是将写作重心放在渲染军容威武上,如“戎车啍啍,啍啍焯焯,如霆如雷”,写战车奔驰,隆隆声响,好似霹雳雷鸣;以“敝彼飞隼,其飞戾天”比喻方叔的英勇无畏。种种笔墨叠加,说明了方叔率领的军队是如何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完胜敌人的。《秦风·无衣》是一首威武雄壮的战歌,彰显了秦军排山倒海般的力量,令敌人闻之胆寒。但这首最能彰

显秦人尚武习俗的诗作,以豪迈口吻诉说的不是穷兵黩武征服天下,而是战友间同生共死的手足之情,诗境超拔,气派非凡。

四、抒写兵心

《诗经》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的辉煌起点,很多诗作实践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所谓“饥者”“劳者”,很大程度上即是不同时代的平民百姓和普通士卒,而《诗经》正是这样一部直面抒写士卒心声的文学经典。《小雅·采薇》不仅袒露了普通士兵“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之”的思乡念家之情,更赞颂了他们“岂不日戒”、时刻准备战斗的军事素质,以及“岂敢定居”、不图安逸的高尚品格。如果说《采薇》诗中有对士卒在战场上“象豨鱼服”、勇于战斗的“大写意”,那么《小雅·渐渐之石》则有呈现士卒远征情境的“工笔白描”,它用感人肺腑的笔触,书写了在“山川悠远,维其劳矣”的艰苦环境下士卒日夜辛劳、尽忠职守的牺牲奉献精神。正所谓“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其实,我军广大基层官兵的现实生活亦如《渐渐之石》所描述的那样,他们远离繁华市井、告别温馨家庭,常年驻守在高山海岛、大漠边疆,他们爬冰卧雪、饱经风霜,却日日复一日的坚守和默默无闻的付出,顽强地守卫着祖国的万里河山,他们不是当时里同样可敬可爱的英雄人物,当然也是军事文艺作品赞颂和歌咏的永恒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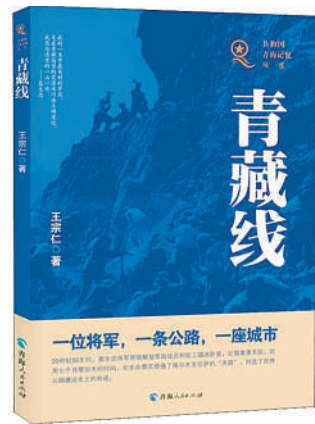
《诗经》开辟了我国古代军事文艺贴近现实、贴近兵心兵情的康庄大道。习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特别提及“《诗经》中反映农夫艰辛劳作的《七月》、反映士兵征战生活的《采芣》”等作品后,谈到了一“切奠基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习主席还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入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军队文化工作者只有传承、弘扬好《诗经》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时刻秉持“为人民大众而歌、为基层战士而写”的创作理念,才能真正创作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官兵的优秀文艺作品。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从孔子的这两句话,可以透视《诗经》对于古人文化心理结构所曾产生的巨大影响。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不仅开辟了独具民族特色的诗歌发展道路,也奠定了包括军事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石。它将“忠贞爱国”“向往和平”“崇文尚武”“抒写兵心”等理念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为新时代强军文化事业提供了深远厚重的思想资源和历久弥新的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稀薄的草滩泛出黄缎子般冷光。两头野牦牛互不干扰地伸出锋利的舌头为草滩理发。”“经过脑子里的水可以变成酒。手心里也能攥起大海的涛声。”在长篇报告文学《青藏线》(青海人民出版社)中,王宗仁通过准确的细节、精妙的比喻和诗性的语言回望充盈着原始伟力的青藏高原,探寻近70年前青藏公路修筑的传奇历史,亲近、想象、描摹慕生志将军的伟岸形象和心路历程。

1954年,开国将军慕生志带领“筑路大军”克服千难万险,在世界屋脊上战斗了219天,修筑了举世无双的青藏公路,开辟了青藏高原的历史新纪元。他是第一个把公路牵到西藏的人,也是第一个坐着汽车沿着公路进入拉萨城的人,被誉为“青藏公路之父”。王宗仁多年磨一剑,以气势磅礴而又细腻优美的记叙,再现了建设青藏公路的艰辛历程,描摹了筑路人牺牲奉献、敢为天下先的人物群像和精神图谱,留存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底色。

提起王宗仁的写作,人们总是会很自然地联想起圣洁高原、雪域边防、绵延的天路、温暖的兵站……作家始终是在行走的状态,俯仰天地的视野、心怀众生情怀、精妙准确的比喻、恣意流淌的诗意、深邃洞见的哲思成为王宗仁作品的标签。长期在青藏高原工作生活,独特的人生经历拉开了王宗仁与内地生活的距离,对高原自然风物、风土民情和生存状态的熟稔,融入作家基于个体生命感悟的深刻认知和独特表达,几乎贯穿于他全部的创作。即便如此,对于慕生志将军当年如何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完成修筑青藏公路的壮举,王宗仁也有着太多的困惑和不懈。对慕生志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王宗仁关注了整整50年。

《青藏线》的叙事是从“找寻”开始的,作者“我”与过去青藏线上的汽车兵赵强老人对话,一个长长的引子从侧面交代了青藏公路的前史。《青藏线》对慕生志这个人物的寻访和想象,最终聚拢起来的不仅是单一人物的形象,更是一种厚重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存在,专属于那个纯粹、质朴而又激情燃烧的时代,带有那个英雄时代的独特质感和光泽。

真实、质朴、深情,在《青藏线》里,王宗仁的叙事语言诗性高蹈、耐人寻味,夹叙夹议间展开作家的思辨和想象。打破故事线性的嵌套结构、推拉摇移的叙事视角、“有我”的对话姿态,赋予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散文文化甚至诗化的风格与神采。王宗仁充分调动起自己作为“老西藏”的经验 and 情感,他对真实历史现场的复现,对英雄精神存在的探索,基于对万物关联的发现,也基于对可能性世界的建构。从当下的采访场景连接到那段遥远模糊的岁月,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勾勒出慕生志将军的

想象英雄时代的精神存在

——评长篇报告文学《青藏线》

■黄传会

剪影,铺展开筑路精神的底色,也重新连缀起一段具有时代特质的英雄传奇。

青藏公路筑路队除了要经受恶劣自然环境的严苛考验外,还得面对工人、粮食、资金、技术短缺的巨大困难。这一切困难,都是被筑路队员们坚挺的脊梁扛过去了。工程队用9米的横梁木跨越了昆仑河,用双脚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踏上了“漏水桥”,用铁锹丈量昆仑山、唐古拉山。慕生志将军当年在筑路过程中留下的地名,有很多直至今日人们依然耳熟能详:纳赤台、小南川、西大滩、沱沱河、不冻泉……1954年年底,青藏、康藏两线竣工通车,慕生志将军乘坐汽车在拉萨城一圈一圈地转。那种难以遏制的豪迈和骄傲,无疑是此前历经艰难险阻和身心磨难的情感释放。

王宗仁将青藏公路的修筑历程梳理为若干重要的时间节点,跳跃性的叙事以点代面,从一种俯瞰的、全局性的视角描绘历史进程,将筑路人的心酸坎坷、牺牲奉献、勇毅果决写得细腻生动、撼人心魄;通过有限的资料、回忆、转述,重返并重建真实的历史现场,走近并最终走进了慕生志将军的心灵和精神世界;以跨越时空的对话方式接续起慕生志将军不惜一切代价修筑天路的内在思想和情感逻辑,进而成功地为其伟大的筑路精神赋形。

王宗仁对青藏高原原有一种虔诚和敬畏的态度,甚至把它看作是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青藏线》中,我们会读到,在主线故事之外,还有大段大段作家基于个体经验、情感的抒情表达、思辨议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宗仁对诸如如人的生存、精神的力量、人性的光芒、人与动物的情义、人与自然关系等等宏大命题的思考和表达,跳脱了事象的表层,达到了审美和哲学的层面;让读者结识了一群有血有肉、平凡中见伟大的人,进一步认识到生命的意义,感悟崇高与英雄的时代内涵。



雪夜巡逻(油画)

时贯宇 王志军作

长征



第5435期

悲壮命运中的崇高与温情

■费鸿

俞胜的长篇小说《蓝鸟》(春风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以东北农村和大连市哈尔滨为背景,书写了边地青年毕壮志曲折顽强的奋斗历程。相比于聪明能干、有着远大追求的毕壮志,父亲毕长贵的形象更加复杂,也更具文学深度。

毕长贵一年中有多半的时间不在家里,开春种下了大豆就会去夹皮沟金矿淘金子,秋收才回来。他连年去,连年空手而归,直到54岁时患了严重的风湿痛才对淘金死了心。尽管毫无收获,但他却为此坚持了20多年,他的倔强与执拗由此可见一斑。在小说中,毕壮志面对人生的困局,总会聪明地选择退让、躲开,以待时机,而他的父亲毕长贵却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父与子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毕长贵如同西西弗斯般循环往复地劳作,永不停歇,每一次重新开始,都是作为理想主义的牺牲者。而在毕长贵放弃去淘金的第3年,毕壮志的老叔独自淘出了金子。在接近获得成功的时候功亏一篑,更为毕长贵这个人增添了悲剧意味。他一直在追求自我人生的圆满,曾经无限接近,却始终无法真正实现,这一过程包含着理想的失落以及作家对生活意义的追问。

毕长贵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自有一套人生哲学,不仅自己认准了淘金的路,也鼓励儿子放手一搏,勇敢地往前闯。无论是毕壮志在毫无经验的条件养殖兔子,还是辍学之后铁了心去大连市哈尔滨找工作,毕长

贵一直都是支持的态度,既为儿子向亲戚借钱,也对儿子的前途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当毕壮志与宋燕秋的小家庭即将破裂时,毕长贵在风雪之夜,拖着患有风湿痛的腿来到哈尔滨,及时缓和了儿子与儿媳的紧张关系。毕长贵作为一个父亲的善良与慈爱,他的默默支持与无私奉献也使得小说流露出温情的一面。

毕长贵的身上有着乐观主义精神,他的一生都在路上,始终怀揣着希望,哪怕这种希望可能是虚无缥缈的。他渴望淘出金子,但却不是一个拜金主义者,金子对于毕长贵来说不是对物质欲望的追求,而是对自己价值的确认。毕长贵眼里的金子,如同毕壮志心中的蓝鸟,同样寄托着人物的希望和理想。毕壮志的蓝鸟飞回来

了,但毕长贵的金子却没有淘到,父与子的命运走向了不同的道路。面对理想的失落,毕长贵并没有自怨自艾,反而十分坦然。

毕长贵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慈父,他有自己的生活目标,也许看上去有几分荒诞,但是从他连年空手而归却永不放弃的人生路径中,我却读到了某种崇高感。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他并没有与家人脱节,而是早已所能地照顾家庭、关心儿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毕长贵的人格独立且健全,这是一个有着强烈主体自觉的人物。他首先是毕长贵,其次才是毕壮志的父亲。从这种具体而微观的父子关系入手,《蓝鸟》将宏大的历史进程书写得真切感人、悲壮却也温情。